建设一片“绿谷” 留下一座“宝库”

——天津构筑“双城”绿色生态屏障

1 科学规划 告别“摊大饼”式发展

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的绿色生态屏障起步区，已是满眼葱郁。

天津市双城生态屏障现场指挥部副组长范树合介绍，起步区占地面积7400余亩，按照林水田湖草与湿地一体进行治理和修复，打造了一个林中有湖、湖边有草、路边有花、林田水草交相辉映的自然绿色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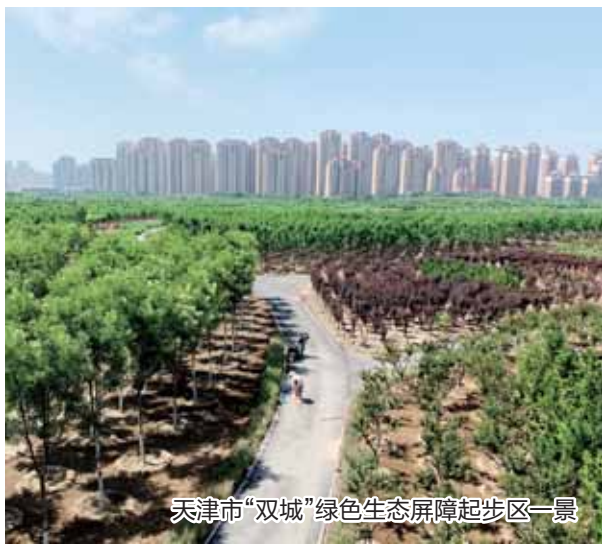
两年前，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做出加强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中间地带规划管控，建设绿色森林屏障的战略决策。2018年5月，天津划定736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区，将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要求及规划管控相关工作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进行规定。

“天津中心城区380多平方公里，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之间相向发展，已经快连上了，极有可能走到国际上的一些特大型城市摊大饼的路子上去。”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说，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之间是沿海通道，需要一个生态屏障，这个生态屏障能够把天津南北两大水系、天津南北两大湿地连起来。

记者采访了解，双城绿色生态屏障区南北向约50公里，东西向约15公里，北连天津七里海和大黄堡生态湿地保护区与盘山和于桥水库生态保护区，进而与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接北大港和团泊生态湿地保护区，进而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将融入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体系，成为环首都东南部生态屏障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天津的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之间，一道相当于中心城区面积2倍的绿色生态屏障正在“孕育”。

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融绿色发展、创新驱动为一体——这一被定位“双城生态屏障、津沽绿色之洲”的区域，将打造成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绿谷”，在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时，将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绿色遗产。



天津市“双城”绿色生态屏障起步区一景

2 综合施策 不止于“看得见”的绿色

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双城绿色生态屏障区分为一级管控区、二级管控区和三级管控区。其中一级管控区将实现三分林、三分水、三分田、一分草的生态空间结构。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陈勇表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此，在绿色生态屏障规划建设中，不仅是植树造林，而是采取“宜林则林、宜水则水、宜田则田”策略，依托生态廊道和河湖水系，挖土成塘，垫土成台，高处种植林木，低处形成水面，与保留农田一起，形成林、水、田交织的新景观形态，进而构建“山水林田湖河草”的完善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看不见”的绿色工程也在稳步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拆迁与生态修复、污染治理……津南区双桥河镇是今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的一处重要节点，片区周边5个自然村落正在积极整治中。

双桥河镇西官房村村民王大娘今年75岁，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她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村里的面貌就有了变化，之前有个臭水沟，一到夏天味道难闻，村里苍蝇蚊子也多。现在修了地下管网和污水站，彻底干净了，环境变漂亮了。听说以后还要做成旅游胜地，村里可以增收致富。”

3 以人为本 馈未来绿色“遗产”

“建设双城绿色生态屏障，是以实现人的可接近性为目标。”范树合说，通过取缔散乱污企业和低效园区，实施生态修复，实施低效制造业转移，发展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业以及文旅产业，同时重视历史遗存的合理利用，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

面对原先天津市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之间城市无序扩张和生态空间的日益萎缩，天津以两个中心城区面积的体量构筑双城绿色生态屏障，体现了市委市政府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的决心和魄力。张国清介绍，一级管控区从去年起已经禁止任何与生态建设无关的开发活动，撤出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

“津南区作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的主战场，两年间共实施造林绿化3.12万亩，形成大绿野趣、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海河南岸生态廊道。”天津市津南区副区长马明扬说，生态屏障为津沽百姓和日后国家会展中心参展客商提供了亲近自然、感悟自然的游憩休闲场所。

据规划，到2021年，一级管控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0%，蓝绿空间比例达到65%；到2035年，一级管控区森林覆盖率不低于30%，地表水主要指标达到IV类，局部达到III类，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100%。

据新华社

夹金山上“马灯红”

在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一张藏族老伯的照片和一盏马灯陈列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内，引来参观者驻足。照片上的人叫作马登洪，是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向导。

1935年6月11日，一支部队走进四川雅安宝兴县，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他们一眼看上去就与本地土司武装和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这便是飞夺泸定桥后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

躲在山上的藏族群众悄悄观察着这支走进他们村子队伍，发现并不像谣传中的那样。终于，有几位胆子大的年轻人决定下山来看看。雅安市宝兴县居民马文礼的父亲马登洪就是其中之一。

“父亲说这些‘码米’(藏语音译，意为当兵的人)不简单，过夜需要生火，可他们不去动老乡家里面已经堆好的柴，反而自己上山去砍。”今年70岁的马文礼回忆说。

夹金山海拔4000余米，山岭连绵，地势陡峭，横亘于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力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想要翻山，没有可靠的向导是不可能的。

当时，马登洪所在的村子只有十几户，隔着好几里地才能有户人家。而他的家就在夹金山脚下，距离大山不过百十米。“我父亲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又接受了红军的宣传，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就答应了红军的邀请，带着另外两位同村的年轻人一起为红军带路。”马文礼说。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可怕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领着，沿着为标记雪塘而用石头垒起来的“望杆”行进。

马登洪等人还告诉红军指战员，要每人削一根“带路棍”用于探路。上了山要少说话，累了也要坚持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千万不能休息，否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实难备足御寒用具，只好向当地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厚实一点的草鞋便上山了。

夹金山的险峻和高寒给红军指战员们带来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的艰苦。一些将领在回忆录中写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人头晕脚软，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有的同志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地倒下去就完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再困苦的自然条件也不能阻挡这支铁的队伍。

从1935年6月12日至18日，中央红军历经7天7夜，终于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为了让红军顺利翻越夹金山，我的双亲都带过路。过山以后，红军送了一盏马灯给父亲，并叫他‘马灯红’。父亲后来便将自己名字改为了马登洪。”马文礼说。

随后，国民党追兵也来到了夹金山下，大肆搜捕给红军帮过忙的百姓。为了避难，马登洪一家也翻越夹金山，到山那边的懋功（今小金县）做了17年长工维持生计，直到当地解放后才回到了家乡。

1949年，马文礼出生了。马登洪给自己儿子取名为“上坤”（藏语音译，意为勇敢）。1968年，这名勇敢的青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足迹遍布中原和西北多省。1985年，马文礼转业回乡，投身于公安事业，直到2009年退休。

“作为一名老战士，我觉得红军长征体现了一种彻底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

这是7月28日在四川省宝兴县拍摄的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

马文礼说，“雅安宝兴县的藏族群众思想觉悟都很高，在汶川地震时，除宝兴外所有通向震中的路都断了，宝兴成了‘生命通道’，宝兴县硗碛乡藏族群众家家出动，在公路上摆着鸡蛋、肉包子、开水，免费提供给来往的救灾人员。”

马文礼说，红军精神要代代传承。今天，马家后代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继承着红色家风。马登洪的孙子马树清现在夹金山下硗碛藏族乡泽根村里为村庄公益出力，孙女马花在夹金山干部学院讲军民鱼水情党课。“红军长征播下的种子将一直被传承。”

据新华社